

寻迹羊城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去年底，春节申遗成功，为这一传统节日增添了更深的文化韵味和历史传承。今天，第一个“非遗”春节如约而至。文史哲周刊特别推出“寻迹羊城”系列，聚焦广州古城最新考古发现，串联两千年的城建史与城市生活缩影。我们邀请专家撰文，展现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魅力。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带着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未来的憧憬，开启新的征程。

专题策划：温建敏 张齐  
专题执行：潘玮倩

广州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

见证两千年城建史  
文化脉络

□ 张强禄



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发掘区已清理城塼区全景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从一处遗址，看广州两千年城建史



“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岭南地区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的写照。

而大唐盛世，海贸繁盛，万国来朝，广州城西界也未变动，只是在西城外蕃坊林立，胡汉杂处，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光孝寺、六榕寺、怀圣寺等更是宗教文化多元包容的见证。根据小马站-流水井遗址东端揭露出的遗迹和出土文物，再结合大马站商业中心、广百新翼、大佛寺大雄宝殿以及解放中路安置房项目等工地的考古发现，不难看出唐代广州城政治文化中心与商业宗教中心的分布内外有别，这既与文献史料中不见唐代广州城有大规模改扩建的记载相吻合，也和唐代城市住宅区(坊)与交易区(市)严格分开的坊市管理制度相一致。

南汉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岭南的地方政权，前后经历55年，算是五代十国中存在时间较长的一个王朝。史载刘岩称帝，改广州为兴王府，大兴土木，凿平番山、禺山，扩建广州城。南汉宫署区就在今广州市中山四路-中山五路一带，文献记载筑有乾和殿、玉堂珠殿、昭阳殿、文德殿、万政殿等多座宫殿。宫城南面是皇城，是中央官署集中的地方。皇城以南至珠江北岸称为新南城，是商业区。北京路“千年古道”揭露出的南汉时期砖铺路面距现地表以下约2.3米，是兴王府南北向中央大街，北面正对宫城南南门，南面通向皇城正南门——鱼藻门。兴王府西南面开凿有“仙湖”，为皇家苑囿，今“药洲”遗址当属其一部分。小马站-流水井遗址东汉至唐代的城墙以西发现有南汉至北宋时期考古研究的堤岸遗迹，且原来地势基本一直向西南倾斜，靠近教育路的探方发掘至现地表下约9米方见原生土，这一带北至中山五路，南至起义路、南至惠福西路，可能都属于南汉“仙湖”，宋代“西湖”的区域。

“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20世纪90年代先后配合公园前地铁站、吉祥大厦(现名捷登都会)的建设在中山五路及其以北揭露出宋至明清时期的六脉渠中的“左一脉”渠遗址，按其南北走向在小马站-流水井遗址发掘区西部当有宋至明清六脉渠穿过，但本次考古发掘并未发现有关六脉渠的渠壁遗迹。不知是位置偏移、改道，或者六脉渠到此是利用了原西湖的水域作为城市水域穿城而过，连通珠江。北宋是继五代南汉之后广州城大规模扩建的时期，原兴王府都城为子城，向东西两侧扩展，形成东城、子城、西城三城并列的

树立“大考古”思路，让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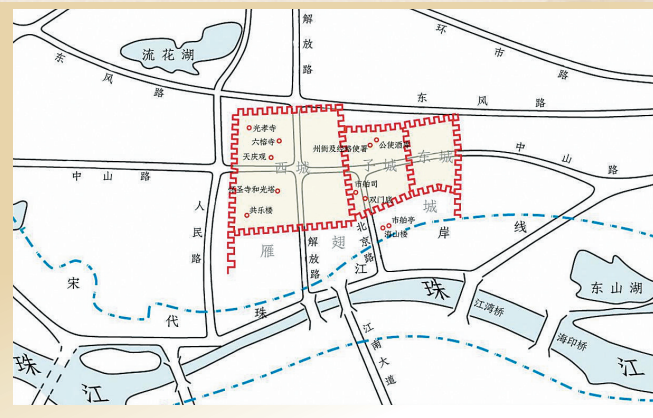
(北地块)展开的。整个大小马站书院群保护项目涉及范围15400平方米，随着后续工作的有序推进，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二、三期的发掘与保护工作也会按程序继续进行。如何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延续城市文脉，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用“绣花”的功夫和智慧，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这不光是城市规划和建设者的职责，更是我们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初心使命。

对于广州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来说，要树立“大考古”的思路，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加快考古资料整理，深化考古成果和历史文化研究阐释。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讲好广州故事、湾区故事、岭南故事。尤其大小马站书院群紧靠西湖路“百年花市”，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行花街”是历年广州春节的重头

戏。2024年12月4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5年1月29日，第一个“非遗”春节如约而至，处处洋溢着喜庆与祥和。怎样在保护第一、加强管理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价值、有效利用，把考古遗产、文物建筑、历史建筑以及非遗民俗、北京路商圈等有机结合，使其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这将是未来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发掘、保护、展示与活化利用面临的大课题，也是践行落实国家文物局部署的“提升考古遗址保护利用水平，促进考古成果转化和多渠道传播普及，系统揭示中华文明的面貌和历史发展的规律”的2025年重点任务。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赓续城脉，读懂广州。

(作者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



▲宋代，广州修城砖。2024年广州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出土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宋代广州三城及重要建筑位置示意图  
南越王博物院供图

子城而废久不修，恐缓急无以御盗。于是，太常少卿魏瓘实知广州，遂城之，环五里。”

魏瓘修城可谓及时。因子城竣工后不久，便迎来依智高的进攻。他听说广州没有城墙，且生活富庶、商户云集——“可以鼓行剽掠，遂自邕州浮江而下，数日抵广州”，“城外蕃汉数万家悉为贼席卷而去”。动乱虽最终平息，子城未被攻破，但广州城西“百年生聚，异域珍玩，扫地无遗矣”。这一事件促使朝廷下定决心，修筑东城与西城。

叁

宋代广州三城的地理位置何在? 据文献记载，宋代广州子城是在晚唐五代广州城的基础上重修而成。2000年在西湖路惠新西街和龙藏街之间发掘的唐代城墙基址，呈南北走向，应为唐末刘岩扩建新南城中修筑的广州城的西城墙，亦即宋代广州子城的西城墙。2024年“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公布的最新考古发掘成果也显示，该区域东部应亦为从汉代至唐广州城的西城墙、宋代广州子城的西城墙。《海录碎事》云：“药洲，在广州朝天门外。南汉氏于兹种药。”可见药洲位于宋代子城西门外，是南汉时开凿而成的。药洲在今教育路南方剧院北侧仍有遗迹保留。从文献记载可知，现古址裕路和教育路一带在南汉时分别为玉液池和药洲，是一片较为宽阔的园林水面，到宋代时，这一带仍然是公共园林水面。宋代广州子城的西城墙就在这一片水域的东侧，即今天吉祥路东侧的华宁里一线。

子城的东界就在今天的旧仓巷西侧。2002年，在大塘街东侧的鸿晖大厦建设工程考古发掘出一段宋代南北向的河堤遗址。2005年在中山四路和旧仓巷交汇处西侧的广州城投集团附楼建设工程地又考古发现了一段南北走向的汉代至宋代重叠的城墙基址。结合文献资料记载以及现存地形地貌综合考察，今日仓巷、大塘街西侧一带就是宋代广州子城东城墙所在，其东侧则是子城东门外的清水濠的所在位置。

1996年在越华路银山大厦和1998年在银山大厦西侧发现的宋代东西向城墙基址，为确定宋代子城的北界提供一个准确的地理坐标。这两次发现的宋代城墙均位于唐代广州城东城墙之东，横跨宋代清水濠之上而建，可知这两段城墙应是宋代广州东城的北城墙。据文献资料记载，宋代广州东城与子城是连合为一的，子城和东城的北城墙是连成一直线，因此，子城的北界亦即东城的北界，其位置在今越华路南侧。

子城的南界，由于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经考古发掘的城墙遗址发现，只能根据文献记载作推测。2002年在北京路广州百货大厦东门发现宋代、明代和清代的古门楼建筑基址，发掘者根据考古发掘的情况，考诸文献认为其为唐末以来广州城内著名的双门古城遗迹。双门古城源于唐末刘隐凿平番、禺二山，叠石而建的双阙，上为蕉樨。随着宋代广州子城的南扩，改南汉双阙为双门，双门古楼成了子城内大都督府前的标志性建筑，由双门再往南才是子城的正南门——镇安门(后改为镇南门)。2000年在西湖路光明广场发现的唐代南北走向的城墙基址，向南至惠福东路尚未尽，证明宋代广州子城的南界应逾于今惠福东路，但向南不会逾过明代广州城南护城河——玉带濠。结合此前在文德北路富春东方广场工地考古发现东西走向的唐、五代城墙基址可推测，宋代子城的南界也就在今文明路、大南路一线的位置。

在此再略述此前对东城及西城四至的初步认识。东城的西界，根据郭集《广东通志》记载：“(东城)西与子城行春门相接，是为东城合子城为一。”可知东城的西城墙即子城的东城墙。东城的北界如上述，亦即子城北界。东界或可推至今越秀北路一带，南界当在今天的文明路北侧一带。

西城的东界，从子城与东城合二为一的情况来看，西城的东城墙或即子城的西城墙。但根据《永乐大典》所附的广州府、南海县、番禺县图来看(因为图中的广州城尚未把北面的越秀山纳入城内，可知图中所绘的广州城墙应以洪武十三年连三城为一之前的广州地形图为蓝本绘成，间接反映了宋元时期广州三城的基本布局)，西城东城墙要比子城的北面向北伸出一段。此外，2000年在府前路北面，解放北路和连新路之间的恒鑫御园工地进行考古勘探和试掘得知：该区域在汉晋至唐时期尚为少人居住的山岗河汉。而到宋代以后，原有的河汉地已被填埋垫高，并在上面建有建筑遗迹，这一现象与宋代西城要比子城向北扩宽的情况是有密切关系的。

1996和1998年，在中山七路与人民北路交界处发掘出明代西城门的瓮城遗址，可推测西城的西界应在其东侧附近，这有待今后考古发现证实。2007年，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松楼南侧工地发掘出一段东西走向的宋至明代的城墙基址，可确定西城的西北界。至于其南界，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考古发掘报道，只能根据文献资料记载作一些推测。据曾昭璇先生研究，“南界即和玉带濠相当。……”这一推论应该是可信的。

(作者者是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

壹

广州，秦汉时期称“番禺”，为南海郡治，亦是西汉南越国的都城。东汉时属交州，三国黄武五年(226年)，孙权以交州面积太大不好管理，于是“分交州置广州”，广州由此得名。后又废，复交州。永安七年(264年)复分交州置广州，广州之名一直沿用至今不改。

晋、南朝时期，广州一直是州(梁、陈两朝为都督府)、南海郡的治所。隋时广州为总管府、南海郡治。唐时广州为都督府(总管府)和岭南东道及岭南节度使府的治地。从晋至唐，广州城的规模不大，也未进行过大的扩展。到唐末天祐三年(906年)，清海军节度使刘隐“以南城尚隘，凿平禺山以益之”，把广州城向南扩展，号新南城。后刘氏称帝，广州作为南汉都城兴王府的所在地。

至宋代，广州城建进入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发展阶段，广州城的范围空前扩大，在唐代子城的基础上重修子城(中城)，然后又在子城之东修建东城，在子城之西修筑西城，谓之宋代广州三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永嘉侯朱亮祖“以旧城低隘，上请乃连三城为一”，并把广州城进一步向外扩展，从此，宋代广州三城旧址湮没。

如今，广州老城区中心已是高楼林立，关于宋代广州城的具体地理位置和城市布局等已难逐一考证。过去，研究广州历史地理的徐俊鸣、曾昭璇等专家学者曾根据文献史料，就宋代广州城的方位、范围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配合广州城市建设中，不断有关于宋代广州三城遗迹的考古发现，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2024年12月27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位于越秀区中山五路南侧、教育路东侧的“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公布最新考古发掘成果。此次发掘面积共2400平方米，现存堆积从汉代一直持续至晚清民国时期。在发掘区域东部揭露出东汉晚期、东晋、南朝及唐代广州城西城墙的一段及其附属设施。结合历史文献和东汉墙体下更早期时期的柱洞、灰坑等遗迹，东汉城墙应是交州刺史步骘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在南越国时期建筑基础上重建番禺城时修筑的。据此，我们可基本确定，从汉至唐，广州城的西城墙其重要一段，位置均在于此。

广州，我国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拥有超过两千年建城史，其城市形态演变特别是城墙的变化发展，一直是城市考古研究的重点。自南越国至明清时期，考古发现逐渐勾勒出广州古城的衍生轮廓，而城市中心始终位于今天的北京路一带，这一现象在世界城市建设史上极为罕见。值得重点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自汉代以来格局基本无改的“广州城”，何以在宋代开始大规模扩建东城和西城? 此变局与历史人物依智高密切相关。北宋皇佑四年(1052年)，儋犹州(今广东靖西)少数民族首领依智高因受交趾国欺压，多次请求归附宋朝得不到接纳而率兵反宋，在攻占邕州后，沿西江一路东下，直逼广州城下，虽未攻陷，却使城西繁华蕃坊商业区遭受重创。由于广州是宋朝最早设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的城市，也是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地，朝廷与民间均意识到筑城护商之重要性，为保障安民，广州城开启了大规模扩建之路。

欲深入了解广州城墙变迁，从相关历史人物入手，是一种关键而生动的视角。

貳

任嚣，或主持修建了最初的番禺城，又称“任嚣城”。广州建城史，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214年，秦定岭南，南海郡尉任嚣主持修建城垣，此乃广州建城之肇始。公元前207年，秦亡。公元前203年，赵佗拥兵岭南，建南越国。目前未发现确切的秦番禺城垣，但在广州市中心的南越国宫署遗址最下层却发现秦代的水井和用木石构筑的护岸，以及云纹瓦当建筑构件等，可以得知南越国都城是在秦代番禺城的基础上建成的。南越国番禺城的南城墙或仅见于西湖路光明广场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的一部分。北城墙则应在今天越华路南侧，因2006年在此发现了南越国宫署的北城墙。

步骘，或是较早知名的建城之人。建安十五年，东吴孙权任命步骘为交州刺史。当他来南海郡，站在赵佗王宫旧址之上远望，观番禺形势“负山带海，博敞数日，高则桑土，下则沃衍”，不由感叹“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郡邑”，于是请准于孙权，把交州治所从广信(今广东封开)迁到番禺。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迁州番禺，筑立城郭”。唐朝时“州城三重”盛境，则由鉴真和尚所目睹。《唐上和东征传》有曰：“端州太守引送至广州，州都督率诸道俗出迎城外……州城三重，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于天子；紫绶满城，邑居逼侧。”鉴真和尚是从如今天字码头登岸，往北穿过三道城门而得见“三重”城景，即由南往北依次为罗城(又称外郭城)、子城及位于子城靠北处的牙城。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元和十四年(819)”条就曾解释：“凡大城谓之罗城，小城谓之子城。又有第三重城以卫节度使居宅，谓之牙城。”

唐至五代，蕃坊盛兴，海丝复兴。而在朝代更迭与风云变幻中，广州城墙始终未历大规模重修。直至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官方才终于“松口”，批准广州修筑一座子城，以护卫府衙和官署附属建筑。“知曹州任中师请修广州子城，仍请置辽海军两指挥，从之。景祐间，中师尝知广州，以州独有